

# 许熙正：“我58岁还没走完青春期”

□ 记者 郭杨如熠

最近,许熙正看了法国导演让·吕克·戈达尔的纪录片,这位电影大师聊到,“我58岁那年才走出青春期。”许熙正被这句话深深击中,当然因为他今年也58岁,更多的是对于叛逆持久性的某种感同身受,不断在试图推翻,永远在自我革新。许熙正甚至觉得,“我到现在都还没走完青春期”。这一年,他把工作室搬来了崇明。

## 醒来即重生

90年代,许熙正几乎承包了台湾乐坛一半流行唱片封面的拍摄。至今,已和数百百家服装品牌和大部分时尚杂志合作过,拍过的明星大咖不计其数,从林青霞、梁家辉、叶锦添,到周迅、莫文蔚、韩寒。在他的镜头中,这些明星仿佛变了个人,总能获得“重生”,许熙正被认为是“时尚摄影界的传奇”,也有“诗人摄影师”之称。

多年前,某知名先锋杂志邀请许熙正拍男装。一贯不按常理出牌的他,提出想找周迅来当模特。他给周迅发邮件:我想要这个片子,迷离,抽象,吸引人,有温度。周迅回复:如果能做到这样就太棒了。

合作达成。这是一组荒僻树林里的大片,女主角在烟雾弥漫中踌躇、奔跑、跳跃,照片里有情绪,仿若梦境,勾人一再观摩。显然,拍摄达到了预期。摄影发烧友深知感觉营造有多难,于是啧啧称奇:果然是许熙正啊。如同许熙正欣赏鬼才摄影师 Juergen Telle,认为他最厉害的不是审美,或是技巧,而是对人的处理。

许熙正说,不仔细看,甚至看不出照片中的是周迅。但周迅不介意,她对那种“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美的照片”没有执念,这和他想的一样。拍摄时,周迅在树林中肆意奔跑,不小心摔倒了,便爬起来再跑。“她是个精灵,还是个疯狂的精灵,和我一样,我也很疯狂。”

可见到许熙正本人,他待人极其礼貌,且有问必答,疯狂从何说起?试图从外表寻找证据,几次见面,那身黑色长袍的连衣帽,没摘下过,确实不走寻常路。想从童年经历挖点线索,据他回忆,小时候特别调皮,带领全村小朋友爬樟树掏麻雀窝,是台湾屏东村有名的捣蛋鬼,常被邻居上门告状,这也顶多算是孩子的恶作剧。

聊起自己的父亲,许熙正如此评价:寡言,外表严肃,做的事情却和“严肃”不搭边。“我小时候,家里是理发店的。我爸那时候没有驾照,有次去台北,居然开了一辆车回来,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。后来,他在乡下开了一家出租车行,可能因为送人去拍照,觉得好奇,开始接触摄影,还得了业余摄影奖,就关了车行,开起了照相馆。”好奇、爱折腾的血脉基因,似乎离答案更近了一些。

了解许熙正的人生经历后,才发现,他所谓的疯狂,关乎自身内在精神结构的重组,体现在每次生活方向的重大转变,只能用他的人生经历进行佐证。

由于和父亲关系僵硬,叛逆来得顺其自然,许熙正不想做父亲做过的事,其实那时他的哥哥在做婚纱摄影,家里资源充足,最终他还是选择去出版社卖童书。而有趣的是,小时候父亲总不允许他看课外故事书,他曾因此耿耿于怀。回过头来看,故事总是充满着戏剧性,有时连本人都没意识到,或许玄机早已暗藏。

这份工作回报丰厚,可每到月底,许熙正总是口袋空空。“实在想不起来钱都花去哪了,对金钱真的没什么概念。”卖童书期间,许熙正的父亲送了他一台单反相机,他空下就来到处拍照。抵挡不了内心深处喜欢,这时候理性更是使不上力,他暗自思忖,“反正赚不赚钱,最后都没钱,还不如去做喜欢的事情”。念头起了,就无法再自欺欺人,当下决定去做摄影。

在许熙正的自我认知中,他是只用右脑思考的人,感性,靠直觉,离逻辑很远。“其实,自从走上了摄影之路,我的人生就开始了不断折腾。”



在短暂担任哥哥助理,在影楼打工五个月,许熙正只身去台北,跟过两任“师父”。一位是商品摄影师,非常讲究技术,尤其是布光,在当时只有拍立得的条件下,拍摄十分耗时,却让他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底子。另一位是从日本回来的女摄影师,以拍摄广告人像为生,许熙正因此接触到人像摄影,没完没了的胶片整理工作,却无心插柳地训练了他的审美。

当时薪水很低,他租在一间地下室,环境潮湿,搬走时,床垫几乎可以滴出水。“我有一个念头,就觉得一定要干好,其他什么都不想,其实也不知道能不能干好。”许熙正说,他几乎24小时都在想摄影,睡觉时脑子里也是摄影。看到好照片,一定会收藏起来,然后向自己提问:照片为什么吸引自己?用的是什么相机?光圈多少?快门多少?用的什么灯罩?打几支灯?投入的自我训练,带来进步的突飞猛进。

1992年,许熙正在朋友的推荐下,正式进入时尚杂志社工作。他翻阅了大量的时装摄影作品,为之着迷,他发现,时装摄影比纪实摄影、街头摄影等艺术摄影更加吸引自己,便认定了要走时装摄影这条路。

期间,他去采访知名服装设计师温庆珠,为她拍了一些采访照,温庆珠感受到许熙正喷薄而出的天分,邀请他为自己拍摄服装画册。这一拍,让许熙正一举成名。“当时,整个台湾业界都震惊了,他们很难相信,这组作品出自一位无名之辈。”那时起,许熙正开始邀约不断。拍时装,拍杂志,每天一到两场,这样的高强度工作状态,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。

他擅长把时装摄影“艺术化”,形成辨识度极高的“许熙正式影像美学”,这在业界持续引发观念震动,影响了一批摄影师。在这份事业中,他的转化能力得到充分发挥。“照片背后需要摄影师投入真实的情绪,如果摄影师本身具有磅礴的生命力,拍出来的照片即便由不懂摄影的人看,也能感觉到不一样。”这也是他后来教给学生最重要,也最难学的内容。

他的才华把他推向了时尚摄影金字塔尖,也推向了牵住本心的绳子的另一头。他看似适应得很好,几乎忘记曾经为何奔跑。

那个年代,在台湾从事摄影的人,大多希望到45岁赚了钱,可以早早退休,许熙正也被这种想法浸染。直到身体亮起红灯,许熙正才“醒”过来:如果是喜欢摄影才去做,为什么会希望早点退休呢。“做着做着偏离了初心,这里面的态度不对了,这样不可能拍出真正的好作品。”

2007年,许熙正离开台湾,来到上海,奔赴“重生”。

## 把石头还给石头

这场离开,将他的人生分成了两部分。下半场,他几易居所,将自己置身海边、荒凉、郊外,迎来创作的“重生”,体验自我的“回归”。

关于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平衡,他一向把握有度。来上海后,他依然功夫在身,依然十分抢手。他和朋友合伙开公司,可毕竟脱不了商业模式,离他想要的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相距甚远,于是开始嫌弃自己的作品,“怎么可以拍得这么丑”。

这个阶段,他在承接商业拍摄的同时,开始了反商业创作的探索——创立了工作室“野草”平台。在这个平台,一群和他拥有一样想法的人,开始共同探索更多创作可能性。妆发怎么弄,灯光怎么打,不做任何设计。对模特也一样,不要求摆特定的动作或表情。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作品,不到最后一刻根本不知道。所有的环节,都在阐述“野草”的态度,放掉技巧,允许无限。

放弃对于严密设定的控制以后,收获了一种不用力气拍摄惊喜。那时起,许熙正开始更喜欢随意的照片。作品中蕴含的能量真实不虚,随着作品能量的打开,创作者精神世界的扩张显露无疑,许熙正决定去更广阔的地方生活。

他一直记得有部日本电影里的桥段。东京一位有名的发型师,逃离城市跑去乡下,在海边选一处空旷地,靠自己的双手搭建房屋,开一家朴素的理发店,有顾客时为人剪发,没顾客时就去冲浪。“那样的地方和人接触不会那么频繁,给思想留出更多空间。如果在一个很新的办公大楼里面,肯定没有那种感觉。有时候忍不住想,最好能隔几年就换一个地方住”。

在大理时,许熙正抱着“我积累的东

西,请随意取用”的心态,从摄影师变成摄影老师。他租了一个民宿,在民宿的院子里铺上垫子,算是摄影课堂。上课在晚上,大家躺在垫子上,就着月色,看电影,聊摄影。“上课内容从不提前准备,课程偏启发类的东西比较多”。

学生们都喊许熙正“大叔”。据他的一位学生回忆,见“大叔”前,紧张到不行,做各种心理预设,没想到见面时,“大叔”的一句“来,抱一下”,瞬间温暖袭来,距离拉近。

“如果你拍的大部分模特的眼神,里面都特别有内容,就表示这个摄影师和模特的互动非常好。摄影师的人格魅力,可以激发模特内在的力量。而摄影师的生命力,最终来自看待世界的角度。”“你里面有多少东西,就会释放出多少东西,那是需要长期积累的。”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想法,还有对‘人’的态度。这是一般人像摄影师比较少做的功课,但它很重要,是一辈子的功课。”这是他反复强调的摄影课程的内核,“生命内容大过于摄影”。

大理之后,许熙正又去了西北。他的助理陈澍是甘肃玉门人,跟陈澍去玉门看过后,他十分中意那里的粗犷,当即决定,“就是这里了”。他们租下了位于北坪区后山上的原电视台大院,进行了简单的改造,然后搬了进去,开始综合性创作。

身处茫茫戈壁滩,向南眺望,能看到连绵不尽的祁连山。一个废弃的电视台,一头驴子,一群学摄影的年轻人,构成了许熙正的荒漠生活。这是他离开台北后,住的第四站,也是迄今对他影响最大的地方。

在玉门,离文明更远,离自然更近。有时,他仿佛觉得可以感知到万物。或许,他所寻求的那个终极创作之“道”,就是要将作品与“自然”融为一体。在荒漠待满3年后,许熙正觉得自己的进步,已经超出了出发时候的期待,“进步快到都快不认识自己”。

不少人一步步攀爬,修炼到可以四两拨千斤的境界,最后得到的变成了负重,后来却往往千金拨不动四两。包袱太多,就怎么也轻盈不起来了。许熙正说,“真正的成熟,是回到儿童”。

渐渐地,许熙正从“大叔”变成“顽童”,爱给别人拥抱,喜欢上重摇滚,比起明星更爱拍普通人,创作内容更不受限,他笑称自己是“许三岁”。

“很多人年纪不大,却总觉得自己老了,我和这些人不一样,我永远想要推翻,在台湾的时候,想要推翻上一代台湾摄影师的拍法,现在想要颠覆现在年轻人的创作。”颠覆,体现在“野草”平台的衍变,不局限于“造型”和“摄影”,衍变成一切皆可创意的平台,跨越时尚设计、艺术和摄影。他设计出超出2个袖子的衣服,创立“野草”服装品牌,把服装寄给买家,推出“跟拍24小时”计划。

他和陈澍也曾想过在玉门办艺术节,希望可以一起在那里做展览。空城化严重的玉门,让许熙正想到了濠洲内海岛,这个曾经的工业废墟,因为举办艺术节,变成了举世闻名的艺术小岛。可受限于当地的城市规划,也因为实在不愿意“迎合”,计划不了了之。在新周刊的一次采访中,许熙正说:“如果一个城市的规划是生态旅游,那推艺术节就是匹配的,才有可能合作。”

兜兜转转,又回到了上海。也许心中生长出更肥沃的原野,可以让自己在城市也能畅快呼吸;也许几番漂泊积累的功力和成果,只有在城市,才能更多地“供人取用”。

可依然需要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,“如果有一个离城市近,离自然也近的地方,那该多好”,在朋友的介绍下,他来到了崇明。这里是岛屿,这里水土丰沃,民风淳朴,这里更像濠洲内海岛。他感叹,“这里可太适合做艺术了,如果把作品铺满崇明的角角落落,一定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”